

還原歷史真相

蕭毅肅上將軼事

(三)

● 蕭慧麟

蔣緯國的鼎力相助

幾年前，顧毓琇伯伯九十歲生日，臺灣早年少數的當權者，看見江澤民尊師重道，對顧毓琇伯伯禮敬有加，又對他表示好感拉關係，顧不得當年入人以罪的政治立場，希冀向北京當局大送秋波了。

談蔣家父子，也不能不談到蔣緯國將軍。蔣緯國和他的「哥哥」蔣經國大不相同。先父和他來往不多，但從下述兩件不為一般人知的事情，就可清楚地看出蔣緯國心地仁慈，謙恭有禮的「另一面」。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蔣緯國將軍以其新著「國防體制概論」一書，就教於先父，先父甚敬佩其精神，特撥冗詳細閱讀，並以讀後感真誠相告。蔣緯國接獲後，在覆函中，竟將對先父的稱呼，由第

一封信中的「毅肅將軍」和自稱「舊屬」，改成四月十一日第二封信中的「毅肅將軍老伯」和自稱為「晚」。

先父去世後，由張群、何應欽、顧祝同、黃少谷、周至柔等五位先生發起，於八月十日上午九時，在臺北善導寺舉行的追悼會那天，先父生前長官（包括嚴家淦總統）、朋友和部下多前來行禮致敬，蔣緯國則避開大眾，於當日清晨七時左右，先行單獨前往，在先父遺像前虔誠跪拜，並稍作停留後才自行離去，充分表現出他對先父的敬仰。

另一件為先父去世後，家母獨力撐持家務困難萬端，推己及人，念國軍退除役軍界耆宿及遺眷生活清苦，政府有失照顧，乃致函蔣緯國將軍請其相助，建議制定政策，定時慰問妥為關懷。蒙蔣緯國將軍

熱心鼎力推動，於一九七九（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函覆家母，說已獲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同意，並已轉函臺灣軍管區司令部，自一九七九（民國六十八）年中秋節起，每年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對軍界耆宿（遺眷）專案慰問的決定。這件事做成以後，家母十分開心，非常感謝蔣緯國將軍、王昇將軍和政府對軍人遺眷和耆宿的關懷，但從未向他人提起。這就是當年「軍人遺眷和耆宿慰問專案」的由來。

人際關係頗受重視

先父不是特務，但卻受到當時所有特務頭子（如康澤、鄭介民、毛人鳳、戴笠等）的尊敬，和不尋常的友誼看待。例如先父由南京調去重慶，戴笠就把他在神仙

洞，有三進大門的房子讓給先父住。後來家母及弟妹們也搬回重慶，那房子住不下了，我們家才搬去嘉陵新村二十四號（抗戰時期的「同袍社」）。雖然如此，還是和所有政府要員一樣，仍然受到特務的監視。

一九四五年春天，先父在昆明擔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病了三天，不意收到朱德從延安打來的慰問電報。先父吃了一驚，自己不過小病三天，延安的朱德竟會知道了，共黨的情報竟這麼靈，那可不得了，便把電報交了上去。

朱德也是雲南講武堂畢業的，先父早年在雲南雖與朱德相識，但他是老前輩，先父不夠資格和他有交情。我們現在想來，也有可能我們自己特務假造電報，來試探先父的。

這種試探方式在商業上尤其普遍，例如老闆或主管故意把錢或貨物數量算錯，就可以看出手下的人是否盡職或誠實。

如果這個電報真是朱德打來的，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好意，一是壞意。第二次大戰後，美國的艾森豪總統，就用這種方式，把蘇聯的能幹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搞垮。美國故意大捧朱可夫，說他二次大戰

時，和艾森豪如何如何有交情，弄得蘇聯頭子對朱可夫起了疑心，把他撤換到黑海去做軍區司令。

我們家住在臺北時，先父每年生日，舊長官和老朋友不是送個花籃就是送張賀卡，也有送點茶葉之類的。我們習慣上是在當天傍晚，把花籃上的名牌取下後，就將花籃一齊送給臺大醫院。有一年，我以為時間差不多了，正要動手取下名牌，先父卻說「莫忙，還有一個人沒來」。我只好等著。果然不久有一個中年人送一小包茶葉來，然後背著手很悠閑地把所有的花籃，和桌上的賀卡及禮物仔細地看了一遍才告辭。我覺得這個人有點與眾不同，就問先父怎知道他會來，先父說「他是黨部的」，我才恍然大悟，他是特務，來收集先父的人際關係資料的。

非因公務不得離開

先父離開國防部以後，有一回勞累過度，醫生勸他到臺灣南部去走走散散心，先父未置可否。家母以為先父為錢的事為難，就勸先父說，只有兩個人用不了很多錢，要先父以身體為重，不要為錢擔心。

先父說錢是一回事，他不想為這事寫報告

請假。家母很奇怪，人已經離開國防部好幾年了還會有事找他不成，到這時先父才說出來，蔣總統有規定，上將級的人員，非因公務，沒有他本人親自批准，不得離開臺北，他不想找這個麻煩。

為此，先父還講起一段往事：剛勝利不久，先父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那時，國府還沒有正式遷都南京，陸軍總部統管光復區的一切，有如軍政府。很多已到南京的中央大員，每逢週末或假日，都喜歡往上海跑。蔣委員長不高興，為此特別下了一道手令給先父，規定中央大員要去上海之前，必須經過先父批准。先父說那時他在軍中雖然有些地位和聲望，怎能和黨國元老中央大員相比，這道手令他根本無法執行，所以只好悶不吭聲，當著沒有這回事。這個手令我們家還帶到臺灣來的，後來又由大妹帶去美國。不幸在大妹和女婿返臺那段期間，家中水管爆裂，連同其他文件一起在地下室被泡成紙漿了。

自行設計受降計畫

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後，先父在史無前例可循的情形下，自行設計了接受中國戰

區全部日軍（和「偽」軍）投降的計畫。當時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除了陳桂華將軍（他那時是何應欽總司令的中校隨從參謀，也是唯一全程參與的先父得力助手，並多所貢獻）以外，恐怕沒有人能更了解那種遠較同盟國其他國家困難、複雜情形的全般狀況。就國府的立場而論，這次受降作業可以說已經接近於完美之境了。

隨國防部的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亦同時結束。由於抗戰末期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人選及統一受降或分區受降之爭，國防部辦理敘勳時，先父對國家的貢獻被抹殺了，僅獲光華甲種一等獎章一座。

（三）事軼將上肅毅蕭

一九五〇（民國三十九）年，先父在參謀次長任內，成功策劃並督導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國軍撤退來臺之執行，使臺灣防務得以增強，免於淪入共黨之手。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為此獲頒比青天白日勳章更高，中國軍人能獲得的最高勳章——國光勳章（國光勳章獲得的條件也和青天白日勳章一樣，必須是捍禦外侮的戰爭，和必須是在作戰中建立的特殊功勳。此外，還必須是在獲得青天白日勳章以後，再建立的殊勳），但先父卻未獲獎勵。周至柔總長既能獲得國光勳章，當然

表示海南和舟山的順利撤退，對國府有決定性的重要影響。然而，實際策劃主持其事先父卻未受獎。我們不相信國防部沒有呈報，卻不知問題出在那裡。

周至柔將軍因此耿耿於懷，屢次建議先父提出重新檢討的要求。先父表示，此事已事過境遷，早就淡然處之了。先父還表示，他一生能「所學得所用」，有機會多次在國家危急之際，作出了救亡的貢獻，於願已足，對此一生已無任何遺憾。至於勳獎，只是後來的表揚，對所作貢獻的本身，毫不發生影響。能受勳固然好，但不是先父追求的目標（除了參加規定要佩戴勳章的慶典外，先父習慣上連勳表也不佩戴的）。

周至柔不得已，乃於一九六三（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致函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希望能有所補救。三年後，經國防部從新檢討呈報國府，才於一九六六（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以「前於民國三十四年輔助策定日軍全般受降計劃及三十九年策定海南與舟山轉進順利達成任務顯著功績」具有陸海空軍勳賞條例第五條之勳績特頒授一等寶鼎勳章壹座。

一等寶鼎勳章，已經是中國軍人在非捍禦外侮的情況下，所能獲得的最高勳章。先父當然感謝周至柔將軍的好意。但是國防部報請授勳的事由，卻不盡與先父當年對國家所作出的貢獻相符合。擬定日本投降的全般受降計劃，先父是主其事者，在授勳事由中變成了「輔助策定」。在策定並督導海南與舟山轉進順利達成任務這件事上，參謀總長獲頒國光勳章，而主其事先父只是「頗著功績」。嚴重減輕了先父對國家實有貢獻的認定。

照顧後輩當仁不讓

先父對自己的功勳處之淡然，但對於後輩的培植及照顧則是積極而且當仁不讓。

下面所述，是我在臺灣左營海軍軍官學校親身經歷的一部分。所幸當時的大環境，已經比大陸失陷前後那段時間安定得多。要不然，海軍官校三十六年班的故事很可能在我們班（四十三年班）重演。即使如此，假使沒有先父的干涉，海軍官校四十三年班就會有三分之一的畢業學生，包含我自己已在內，蒙受不白之冤，而白白失去了為國家服務的機會，和自己的前途。

（先父採取干涉行動時，並不知道我也是這四十七人中的一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從海軍軍官學校（四十三年班）畢業，全班一百五十二人都被分組，到海軍的術科訓練班去受六個星期的職前訓練，然後再派到艦上當見習官，等候（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正式派職。

我看了分組名單，覺得有點奇怪。因為我畢業的名次是第十七名，我的名字卻排在好後面。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我向同班同學劉欽博說起這件事。他是第十九名，他說他也有同樣的感覺，於是我們開始「破密」。結果顯示，一百五十二人中，共有四十七個人被挑出來，然後仍然按名次的先後，一起搬到畢業最後一名的後面去。分組的方式，就是按照這個新名單排出來的。

我們百思不得其解，但斷定一定有原因。

後來，又發現這四十七人中，很多都是杜榮生指導員不喜歡，或是曾經和他發生過爭執的。意識到事態可能相當嚴重，我就去找曹仲周校長。

曹校長起先不承認有這件事，但又問

我怎麼知道的。我向他解釋後，他沒法抵賴，才承認說：「因為你們這四十七個人，忠貞考核不及格，見習期滿後，就要調下地，只能服地勤，不能上船。」

這真是青天霹靂，再怎麼也沒想到會這樣嚴重。

我非常激動地對曹校長說：「從我們進官校那天起，學校規定，每個人都給八十分的品行分，在校四年中，好就加分，壞就扣分，畢業時算總帳。」

「我在學校四年中，不但學業成績年年往上爬，到第七學期的學期成績，我已是全班的第三名，而且從未受過任何處罰，也未犯過任何校規，品行分數年年增加，怎麼現在會不好了？」

「如果我有錯，在這四年裡，學校為甚麼不告訴我，教我，到現在才說我不好！不准上船，這不等於毀了我的一生？」

「這情形，就像法官判人有罪，但判決書上卻沒有罪狀，這樣的判決能成立嗎？」

「校長經常說，大家要以校作家，校長就是大家長。今天我受了冤枉，請校長為我洗雪伸冤。」

不料曹校長很乾脆地說：「我沒有辦

法！」

我非常奇怪，就大聲問：「校長，你怎麼會沒有辦法？」他無奈地說：「我又不認得你們。你們的指導員（註：杜榮生）說你們不好，你們的隊長（註：趙鳳麟）蓋了章；大隊指導員（註：忘了是誰）和大隊長（註：陳東海）也蓋了章；學校政治部主任（註：吳寶華）也蓋了章，我只有蓋章。」說得可憐兮兮的，又完全不負責任。

我再問：「這麼嚴重的事情，這樣多人，校長就不查問一下？」他默不做聲。

我再追問：「那校長是決定不管了？」這時，曹校長有些不耐煩地說：「我是沒有辦法的。你們要有辦法，隨你們自己想辦法去。」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再說也是多餘，只能既憤怒又傷心地離去。

過不了多久，我們有一次回家的機會，但心中十分為難，怎麼對爸媽講呢。在官校時，指導員的確不喜歡我，但那不是我的錯。

杜指導員到任的那天，可能到得很晚，趙隊長沒有來得及向我們介紹。不巧，那晚我值寢室的夜更。半夜裏，忽然看見

一個只穿汗衫內褲的陌生人，東張西望地往寢室外的黑地裏溜。我就端着槍跑過去叫他「站住」，然後問他是甚麼人。他說「我是來接你們指導員的」，我奇怪的問「這麼晚了，你接他到那裏去？」，他只一再地說「我是來接你們指導員的」。到後來我才弄清楚，啊了一聲說「你是我們的新指導員」，他點頭說是。我又問他到黑地裏去做甚麼，他說要小便，我就向他指明廁所的地方，還向他表示歉意後才離去。

過了大約兩三個星期，杜指導員找我談話，閑聊了一陣後，忽然表示他本來是少校，被海軍總政治部的趙龍文主任降為上尉，要我想辦法恢復他的少校軍階。我覺得奇怪也不妥，這不是我該管的事，就對他表示我幹不來。但他卻不斷的拉同鄉關係，執意要我幫忙，說他是被趙龍文整冤枉的。我當然堅持不答應，大家弄得很尷尬。從那以後，我們之間就格格不入，他總是想法為難我，但又找不到我的錯。

同班同學王寶榮在臨畢業前還沒有一入（中國國民黨）黨，學校要執行不是黨員不能畢業的政策，連忙找理由開除他，

不到一個月，被記兩大過兩小過，理由是集合遲到（大過一次），穿黃軍便服外出（大過一次）；直到這時，學校當局才發現王寶榮「品學兼優」，他不但功課好，在校四年來還經常參加各種活動，記功嘉獎極多，品行分數已高達一百二十分，無法打成不及格，只好把他列入「忠貞」考核不及格。

班上的劉審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他登記了父母親要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但當天他的父母卻被擋在軍區大門外，等了四個鐘頭，直到典禮完畢，蔣總統走了才得進來。

劉審智去質問指導員，為甚麼學校請了的又不准進來？杜榮生說他忘了寄來實證。劉審智很生氣，衝口而出「忘了？你幹甚麼吃的？」杜指導員就指著他說「笨驚不馴！你給我小心點，不要以為你畢業了，總要叫你知道厲害。」劉審智就對附近的同學大叫說：「你們聽見的，他叫我小心點！」這樣，劉審智的「忠貞」也有了問題。

曹校長的話，不斷地在我腦中打轉，回到家不說也不行。找了個機會，趁媽媽在一起，我結結

巴巴地才說到有四十七個人的忠貞考核不及格，不能在艦上服務，先父就十分詫異地問：「有這樣的事？到畢業，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忠貞考核不及格，那你們海軍的教育是怎麼辦的？」我一時為之語塞，我自己也是這四十七個人中之一的話，就沒有說出來。停了一下，先父叫我把這件事簡單地寫在小紙條上，放在他的眼鏡盒子裏。

我們見習期滿派職時，這件事好像已經解決了。除了八個志願轉到補給官科外，大家都留在艦上服務。

我們這一班，從民國四十三年畢業起，一直到四十三年後，最後一個人從海軍退役為止，並沒有出現過「不忠貞」的人或事。在海軍的服務成績，也沒有比任何一班差。

事實證明，四十三年班還是好的。不是非觀念與道德勇氣，竟然放縱少數卑劣的政工人員無法無天殘害學生。

如果不是劉欽博和我發現機關，如果不是曹仲周校長說出真情，如果不是先父干涉，我們這四十七人就要冤沉海底，永無翻身之日。